

拉达克王国 :公元 950-1842 年(七)

——拉达克力量的衰退

[意]L·伯戴克 著

扎 洛¹ 译 , 彭陟焱² 校

(1.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北京 100081 2 西藏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 陕西咸阳 712082)

摘 要: 本文论述了 17 世纪下半叶拉达克王国在来自喀什噶尔的突厥人和来自卫藏的蒙古 - 西藏军队的双重打击下 ,逐步走向衰落的历史进程 ,从而结束了拉达克王国作为喜马拉雅地区重要力量的角色。

关键词: 拉达克 喀什噶尔 卫藏 衰落

中图分类号: K29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388(2010)04-0017-13

拉达克王国的衰落

起初 ,次旺南杰(tshe-dbang-rnam-rgyal)仍沿用着王子的称号 ,1754 年有关嘉色仁波切(rgyal-sras rin-po-che)^[1] 的文献和另外一个题文(F.79)中就是这样称呼他的。后来 ,摄政嘉色仁波切卸任或辞世了 ,次旺南杰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国王 ,确切时间不详 ,大约是在 18 世纪 50 年代末。

与国王尼玛南杰(nyi-ma-rnam-rgyal)的情形相似 ,这位国王颁发的许多文书也得以保留 ,我们很容易给出这些文件的清单 :

1、1755 年为管理支木工差(vu-lag)的噶佩勒(dgav-pheI-le)颁发的文件(见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文献 9/16)。

2、副本 ,标时 1758 年 5 月初 8(西历 6 月 14 日) ,是一份给一些来自如雪(rupshu)地方的人特许放牧权的残本文书(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文献 9)。

3、1760 年应大臣贡恰贝佩(kun-khyabs-dpal-vphel)之请 ,为托格(tog)的热丹(rab-brtan)颁发的文书 ,1715 年他曾前往蒙古地区(格尔甘《拉达

克王统史——甘露藏》,文献 9/10)。

4、1760 年为托格的次仁(tshe-rin)颁发的文书 ,他为 1759 年时率领军队反抗斯卡尔杜(skardo)统治者的指挥官诺诺旺杰(no-no dbang-rgyal)和阿旺(ngag-dbang)提供了帮助(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文献 9/11)。

5、1760 年 2 月 19(西历 4 月 4 日)为顶莫岗(gting-mo-sgang)的甘巴彭措(vgan-ba-phun-tshog)颁发的文书 ,他在 1759 年反抗斯卡尔杜统治者的战争中履行了全部的责任(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文献 9/12)。

6、1761 年 3 月初 8(西历 4 月 12 日)应贡恰(kun-skyab)的请求为赫纳古(he-na-sku)大臣扎西坚参(bkra-shis-rgyal-mtshan)颁发的文书 ,他曾作为救援远征军的将军(dmag-dpon)前往索(bsod)地区 ,并再次出使克什米尔(kashmir)(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文献 9/1)。

7、1762 年颁发给诺诺扎西(no-no bkra-shis)的文书 ,他在惩罚楚臣多杰(tshul-khrims-rdo-rje)之时获得了额外的田地(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文献 9/15)。

[收稿日期] 2010-05-30

[作者简介] 扎洛(1969-) ,男 ,藏族 ,青海兴海人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所长助理 ,史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藏族历史与文化。

8、1762年6月初8(西历7月28日)为努布约,它还涉及对楚臣多杰的惩罚(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文献 9/5)。

(nang-so-bkra-shis)颁发的文书,1762年他作为努布拉的将军为国王效力,当时他俘获了卡达夏·凯尔曼(kar-tag-sha mkhar-mang)的瓦齐尔·奇(wazir khyi)及其他20人,攻克纳萨塞尔(nar-sa-ser)城堡,俘获该城首领及其他18人(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文献 9/3)。

9、1765年5月颁发给噶伦旺杰(dbang-rgyal)的文书,他被派遣前往陪伴国王的祖父(me-me)和穆贝(mulbhe)国王(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文献 9/9)。

10、木马年12月13日(西历1775年1月14日)应司库(bkav-phyag)诺诺次旺贝巴(no-no tshe-dbang-dpal-vbar)的请求为谢赫(sheh)的首领

(grong-dpon)罗桑(blo-bzang)颁发的文书,他曾给予国王的侍卫良好的建议,使他们安全抵达该城(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文献 9/2)。

11、1775年赐予赤色寺(khrig-se)的特许状“1773年时,我(指国王)被废黜,遭到驱逐,毫无权力,从没有人像赤色寺的主持、上师和僧众那样对我友善。现在我取得这样的地位,我决定将努布拉的德吉寺(bde-skyid)划归赤色寺管辖”(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文献 9/8)。

12、1776年2月初8(西历3月27日)颁发给谢赫的次仁(tshe-ring)的文书,他在1759年远征巴尔蒂斯坦(baltistan)期间,派军队给卡普鲁(kha-pu-lu)的首领(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文献 9/14)。

13、1777年因向国王提供服务而给顶莫岗的次仁觉巴(tshe-ring-vbyor-ba)颁发的文书(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文献 9/6)。

14、1777年为桑噶(zangs-dkar)的阿旺嘉措(ngag-dbang-rgya-mtsho)颁发的文书,未知细节(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文献 9/7)。

15、1779年3月为门采尔(mon-tsher,或称menser或miser,是拉达克在西藏西部的飞地)的头人(vgo-ba)颁发的文书,他曾经专横地欺凌贫困牧民(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文献, 9/4)。

16、1779年颁发给阿里活佛(mngav-ris sprul-sku)罗桑格勒意希扎巴(blo-bzang-dge-legs-ye-shes-grags-pa)的文书,给予他掌管噶查寺(dkar-cha)、普苔寺(phug-thal)、鲁杰寺(klu-vkhyil)、穆贝寺(mulbhe),以及桑噶的让东(rang-vdum)地区并特许在指定的界线范围内免除税赋的权利(迪特·舒《卫藏、拉达克以及桑噶的文件及往来信函》,LXXXI)。

17、1780年经核准给一个叫索南伦珠(bsod-nams-lhun-grub)的人收养一名孩子的契

18、1781年4月26日(西历6月17日),为金匠伊斯迈尔(ismail)颁发的文书,他是为国王铸造货币的银工(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文献 9/13)。

在次旺南杰执政的最初几年里,政事都委托给了大臣贡炯贝佩(kun-skyong-dpal-vphel),通常称为kun-skyob或kun-skyab。他在次旺南杰享有王号之前就已经承担公职,1761年后以大臣身份继续工作^[2]。他在几份文献中都被提及(F.80 F.115 F.182),其中最后一份(所谓的Li-kyir mahatmya)最

为重要,其内容是庆祝寺院的重建,该寺院在第七日)应司库(bkav-phyag)诺诺次旺贝巴(no-no tshe-dbang-dpal-vbar)的请求为谢赫(sheh)的首领然坍塌^[3]。

贡炯执政期间的标志性成就是恢复了与西藏和中国清朝的关系,这缘于清朝最终战胜准噶尔(dsungars)以及随后对中亚的征服。这样,清朝也成为拉达克北部边境的邻居,并且控制着通过喀喇昆仑山(karakorum)的商路。事实上,在导致清朝对喀什噶尔(kashgar)和叶尔羌(yarkand)的军事征服中,拉达克也被卷入其中。这两个城市那时被和卓(khojas)即两个宣称是属于先知(prophet)传承的穆斯林家族统治着。他们承认准噶尔的宗主权,准噶尔的覆亡使他们暴露在所向披靡的帝国军队面前。

于是波罗尼都(burhan ed-din)和霍集占(khoja jihan)兄弟俩领导了抵抗运动。其主要情节即是叶尔羌城漫长而牢固的防御战,兆惠(chao-hui)元帅的军队也被包围在他的营地长达几个月的时间(从1758年11月到1759年2月),最后不得不撤军。1759年7月的第二次战争攻陷了喀什噶尔和叶尔羌^[4]。在围困叛军的漫长的冬季里,拉萨的驻藏大臣

(ambans,也负责与拉达克的关系)主要关心的是如何防范叛乱首领逃亡邻国,在那里他们有可能骚扰帝国的新统治区。一个可能的庇护所就是拉达克,因此驻藏大臣伍弥泰和官保准备派遣一小股军队去阿里(mngav-ris),如果霍集占试图逃亡拉达克,那么他们就配合兆惠的军队进行拦截。但是来自北京、深得皇帝信赖的高级活佛章嘉呼图克图(lcang-skya qutuqtu)表示反对,并愿意对撤销这次行动承担责任,他当时被派往西藏监督寻访新的达赖喇嘛。他认为,这种传闻可能有误,因为拉达克统治者一直表现的顺从而愿意合作,也曾表示将逮捕并移交任何逃亡者。皇帝同意了他的意见,甚至斥责了两个驻藏大臣(1759年1月26日)^[5]。

就在“拉达克汗(khan of ladakh)”向拉萨报告叶尔羌的败亡和霍集占逃向西得沙堪(his-tê-sha-kan)的消息后不久,他们即发现这一消息是草率而不准确的,但是拉达克的统治者害怕清朝的干涉,便确定了自己的和平立场,请求兆惠

下令军队不要深入拉达克。他的害怕是毫无根据的,但是皇帝还是给兆惠发出了合适的指令(1759年2月3日)^[6]。众所周知,波罗泥都和霍集占逃到了巴达克山(badakhshan),并在那里被杀^[7]。章嘉呼图克图接到上谕(1759年9月3日和12月12日)向阿里的官员和拉达克的统治者通报关于“叛乱者”逃跑和死亡的情况^[8]。

因涉及与中亚的贸易关系,拉达克向西藏派出另一个外交使团。“拉达克王(la-dvags sa-skyong)”的使者于1760年2月2日在扎什伦布寺受到接待^[9]。在此之前,他们当然已经到过拉萨,但是达赖喇嘛的位置仍然空缺,因此我们在第八世达赖喇嘛传中找不到任何关于此事的信息。然而,一份中文档案对此做了饶有趣味的肯定。在1760年5月12日,北京收到的一份来自叶尔羌的满族将军的报告,其中称一位名叫扎西嘉措(skra-shis-rgya-mtsho)的拉达克使者绕道西藏到达Sanju地区。他是拉达克汗的送信人,信中称对征服喀什噶尔表示祝贺,请求保持两地的贸易如以往一样畅通无阻。这位满族将他带回去并问了他几个问题后,送给了他一些礼物,允许继续他的旅程^[10]。遗憾的是当时没有提到拉达克统治者的名字。

此后,拉达克与拉萨政府的政治关系缺乏记载。除了派新的僧人到西藏的寺院进行学习,文献记载仅局限于偶尔地记载拉达克每三年一次的商贸使团(lo-phyag)。

1759年在巴尔蒂边境上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单个事件,当时,希噶尔的首领(shi-sgar jo)胡赛因汗(husain khan)^[11]被斯卡尔杜的统治者穆罕默德·扎法尔汗(mahmud zafar khan)^[12]逮捕入狱,他当时得到吉仁(keris)的米尔·伯克(mir beg)^[13]的帮助,征服了库仁(ku-res),并准备进一步侵袭卡普鲁。面对即将来临的进攻,卡普鲁的首领马哈木德·阿里汗(mahmud ali khan)^[14]和过去一样向他的拉达克领主请求援助。拉达克的军队在诺诺旺杰普里格的前任首相)和诺诺阿旺(no-no ngag-dbang)的指挥下进行战斗。斯卡尔杜的军队被击退,胡赛因汗被释放回到了希噶尔,米尔·伯克投降^[15]。之后,巴尔蒂边境又恢复了好几年的和平。

内部局势也很不平静。国王是一个容易受他人影响的人,不称职且带有暴虐倾向。很快,那些贵族便不得不集结一支武装力量迫使国王发誓要保护他的臣民,并不再压迫他们。此后数年局势平稳,国王允许大臣贡炯尽其所能治理国家^[16]。后来,由于受到一个叫米尔咱·马力克(mirza malik)的穆斯林(一个商人?)的影响,国王喜欢上了品种优良的中亚马(ti-pi-cag,来自于突厥语 tobcaq),并逐渐达到了痴迷的程度。最终他拥有500匹马,由大量的马夫来照料。为了满足这个昂贵的兴致,他就得更加残酷地压榨人民^[17]。他的朋友多是穆斯林,他渐渐地疏

远了佛教,也不再遵守当地的风俗习惯而开始倾向于伊斯兰教,任凭他的大臣们怎么恳求,都是徒劳的。比这更糟的是,他被一个最底层(bhegar)的、通常被称为比比(bibi)的穆斯林女孩子迷住了。这个女孩和她的兄弟纳西布·阿里(nasib ali)和拉西姆(rahim)从普里格的噶则(dkar-rtse)来到列城。国王深陷于对她的爱怜之中,迎合她的哪怕是最小的兴致。他的前妻离开了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桑拉(bzang-la),国王随即与比比结了婚,人们用半玩笑的口气称她“贝姆坚(bhe-mo rgyal)”。官员们试图反对这桩婚事,要求国王给出一个解释。然而国王听从新妻的建议,用恐怖手段来镇压反对者。结果大臣贡炯和顶莫岗村庄的首领(grong-dpon)被杀害,数位贵族被抓进监狱,脚上带着沉重的铁镣。为了增加他的收入,国王要求一年交三次税。情况变得越来越无法忍受,整个国家被比比家族压榨殆尽,纳西布·阿里甚至被任命为首相。这种状况延续了一段时间。最后,陷入了绝望的贵族和人民终于揭竿而起,攻击列城皇宫。国王毫发无损,但是比比被钉在了市场(bazar)的大门上,活活地用鞭子打死了^[18]。她的兄弟们下落不明。

这一悲剧具有令人警醒的效果。贵族和官员们再次宣誓效忠国王。后来,国王和索(bsod)地首领的女儿结婚,婚后生了两个儿子。他又重新任命了一位首相。

与此同时,普里格的国王扎西南杰(bkra-shis-rnam-rgyal)于1758年去世,他的王国被拉达克吞并。他的妻子丹增布赤(bstan-vdzin bu-khrid)继续留在穆贝,受她的弟弟、前首相旺杰(dbang-rgyal)的保护,他曾被任命为罕佩(hem-babs/dras)城的指挥官。他平常表现出色,国王和皇后都很感激他(1764和1765年)^[19]。后来他的姐姐剃发为尼,他曾陪伴她前往拉萨朝圣,1768年下半年他们在拉萨拜见达赖喇嘛^[20]。那时次旺南杰已经选用他作为新任首相。

这次的选择又是一个不幸,旺杰是一个贪婪之人,他骄傲自大,且让人们承担了更为沉重的税收^[21]。但是拉达克的官员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处理君臣关系。1773年他们再次聚集在一起,逼迫国王让位,并将其贬往赤色寺。旺杰被流放到西藏西部(另一种说法是被软禁)。或许反叛者内部未能达成共识,或者发生了复辟行动。事实是在4-5个月,国王复职,旺杰被召回^[22]。

在国王统治的最后时期,也许是受到他第三个妻子的影响,他越来越倾向于伊斯兰教的什叶派(shia),重新起用了阿乞巴特·马合木特汗(Āqibat mahmud khan)这个旧头衔,连续三年克扣列城传统的祭祀燃灯仪式的开支,而把这批资金投入到了养马活动中。只要可能,他对马的痴迷与日俱增,这花费了国家大量的财富,而其中的大部分都被旺杰侵

吞,也正是他将国王推进了虎口^[23]。

也许是为了获得现金以弥补这些巨大的开支,国王重新起用(莫如说是开始)在森格南杰(seng-ge-rnam-rgyal)和德勒南杰(bde-legs-rnam-rgyal)时期就得到同意,但从未实际推行的穆斯林形制的拉达克货币。1781年一位列城的穆斯林金匠被雇来铸造拉达克的货币^[24]。这种货币的一些模范保存至今,但是币面上可读的字样只有zarb-i-Butan(拉达克制造)^[25]。

为了这一时期的情节完整,我们应当提到另一位在德西德里(desideri)和弗雷里(freyre)之后第一个穿过拉达克的欧洲人。他就是俄国中尉艾福瑞莫夫(efremov)。他曾在吉尔吉斯(kirghiz)被抓进监狱,囚禁八年之后,他寻机向南逃亡。他先到达浩罕(kokand),随后到达叶尔羌,他在那里待了一个月。然后在一些商人的陪同下,翻越大山继续他的旅程。大约在1781或1782年到达列城,并在那里待了二十五天。然后他前往克什米尔、加尔各答(calcutta),最后从海路回到了俄国^[26]。

这一依靠征收重税来增强其经济实力的灾难性统治在另一场革命(1782年)中宣告结束。叛乱者占领了列城,国王和首相逃往赫尔密寺,受到米旁(mi-pham,后面我们将介绍)的保护。国王复位的梦想彻底破灭了,他同意让位,但条件是必须确保他和旺杰(当时人们很想杀掉他)的安全。如通常情形,国王获得了赛赤(gser-khri)和萨布(sa-bu)作为维持生活的领地,在玛卓(ma-spro)获得可以饲养他钟爱的马匹的草场^[27]。不知何时他在玛卓去世。

次旺南杰的第一个妻子是来自桑噶的桑拉家族(好像)叫贡尊旺姆(kun-vdzom dbang-mo)。当他娶比比或“贝姆坚”为妻时,贡尊旺姆返回家乡嫁给桑噶国王为妻^[28]。当比比的悲剧结束后,国王又另娶了普里格索地的一位穆斯林姑娘贝金旺姆(bhe-kim/begum dbang-mo)为妻。她为国王生了两个儿子:拉钦米居次丹南杰(lha-chen mi-vgyur tshe-brtan-rnam-rgyal)和次贝米居顿珠南杰(tshe-dpal-mi-vgyur-don-grub-rnam-rgyal)。当父亲退位时,他们还只是孩子。他的妃子喀顿次仁(khatun tshe-ring)生了一个儿子,叫晋美南杰(vjigs-med-rnam-rgyal)^[29]。

他的家族中最重要的事物是嘉色仁波切的儿子杰贡嘉色米旁次旺赤列丹增米居多杰(skyabs-mgon rgyal-sras mi-pham tshe-dbang-vphrin-las-bstan-vdzin mi-vgyur-rdo-rje),他大约出生于18世纪的40年代。噶妥仁增(kav-thog rig-vdzin)为他祈福、灌顶(dbang-bskur),并于1753年为他取了法名^[30],他成为赫尔密寺的住持(khri-pa)。他和他的兄弟可能就是司徒班钦(si-tu-pan-chen)于1762年在拉萨遇到的“拉达克的兄弟(sku-mched)或”

“拉达克的嘉色(rgyal-sras)^[31]。1764年7月15(西历9月10日)他们两人到达扎什伦布寺,9月初1(西历10月26日)之后兄长米旁(mi-pham)前往恰域(bya-yul)^[32]。1767年10月初5(西历11月26日)他带着赫尔密寺的三十个弟子再次来到扎什伦布寺,他们在1768年2月12(西历3月29日)的隆重集会上宣誓出家^[33]。一位竹巴派的住持寻求在著名的格鲁派寺院为他的门徒们进行神职授任活动是极为特殊的。同年,赫尔密寺的管家(md-zod-pa)或许是受他的委派访问了拉萨^[34]。1769年10月19(西历11月17日)米旁又一次来到扎什伦布寺,并在1770年新年之际与三十个拉达克的僧人一同被授予圣职^[35]。就在他即将离开班禅之际,班禅将他认作自己的侄子^[36],并向他建议“(拉达克)内部将发生争执,当今的国王(sa-skyong)将辞世,为了成为统治者,你应该有坚定的信仰。尽管这样的提议听起来不太好,但是你要把它记在心里”^[37]。很明显,在1770年时,1773年将要发生反叛的气氛已经到处弥漫,并且有一个集团希望将米旁推上国王的宝座。但是他为未来保存了自己的力量。1781年文献中再次提到米旁,他被列在为班禅灵塔捐资的显贵人物名单之中^[38]。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1782年时他一度手握实权。

米旁是我们在前面已经多次引用过的、赫尔密寺两个著名题文的作者。第一个题文发现于大玛尼墙(man-gdong)上,尚未刊布,其中提供了一些按年编写的素材,但是有些细节还不够确定:认为米旁在出任住持期间,国王次旺南杰和他的儿子们在鼠年和牛年建造玛尼墙(mani-wall),是为了给皇后母亲(queen-mother/a-yum)贡尊尼达旺姆(kun-vdzom ni-zla-dbang-mo)做超度,时间大约在1780年和1781年。同样的,第二部的时间也不够精确,存在一个明显的错误。关于这部文献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它大约在一个世纪前由施拉克因特维特(E.v.Schlagintweit)刊布^[39]。他误认为玛尼墙是森格南杰为了纪念赫尔密寺的创建而建造的。事实上,玛尼墙是米旁为了纪念赫尔密寺大殿(gtsug-lag-khang)于水虎年(1782年)奠基,水马年竣工而建造的,这个时间对应的不是1762年就是1822年,第一个显然是错误的,我们可以判断可能是火马年,即1786年。根据玛尼墙开头部位的题文来看,玛尼墙开始建造于铁狗年即1790年。

在赫尔密寺至少由三尊米旁的造像,都是极为生动的肖像,白色的尖胡须,半慈祥半嘲讽的微笑。他是艺术活动的施主:参康(vtsham-khang)里的几副唐卡和赫尔密寺巴帕拉康(bar-pa lha-khang)内巨大的镀金佛塔都是他下令建成的。他把著名的“十日祭祀节(Ten Day's festival)”引入赫尔密寺。在他的领导下,寺院开始富裕起来。他于1808年9月18日(西历11月7日)圆寂,1810年在拉萨为

他举行了超度仪式^[40]。

在这里我们不妨讨论一下赫尔密寺管理权的继承问题。二世活佛阿旺措杰多杰(sprul-sku ngag-dbang-mtsho-skyes-rdo-rje)去世的时间不详,但是大约在18世纪的前二十年。按照当地的说法,他的继承者是一个叫嘉色活佛(rgyal-sras sprul-sku)的人。在赫尔密发现了受德钦阔荣增(bde-chen-chos-vkhor yongs-vdzin)之命于1814-1817年间编写的Samonatha祈祷文中,把他称为丹增米居多杰(bstan-vdzin mi-vgyur-rdo-rje),形式与赫尔密寺大题文中的次旺赤列丹增米居多杰(tshe-dbang-vphrin-las-bstan-vdzin mi-vgyur-rdo-rje)几乎完全一致。唯一使人困惑的是得到卫藏地区资料支持的噶妥(kav-thog)的传记中曾多次将赫尔密活佛的头衔给予他的父亲降白图道(vjam-dpal-mthu-stobs),尽管在传统的世系名册中没有可以容纳两个嘉色的空间^[41]。

我们对该家族其他成员的情况有所了解。1769-1770年米旁是在他的一个兄弟的陪同下到达扎什伦布寺的。他的这位兄弟叫罗桑赤列坚赞(blo-bzang-vphrin-las-rgyal-mtshan)是一位被赋予某种神秘力量的喇嘛^[42],他可能是贡尊皇后的儿子,《拉达克王统史》中描述他“在医学上很有天赋,去过拉萨”^[43]。他和那位在1764年陪伴米旁去扎什伦布寺的兄弟不是同一个人,因为他在那里已经削发,被授予法名为洛桑扎西(blo-bzang-bkra-shis),并于1766年受戒成为正式的僧人^[44]。洛桑扎西于1774年再次到扎什伦布寺,1775年9月班禅为其灌顶^[45]。然后他一直待在扎什伦布寺,1781年诺诺噶钦洛桑扎西(no-no dkav-chen blo-bzang-bkra-shis)为第三世班禅(即第六世班禅——译者)的灵塔建造给予捐助^[46]。最后,我们应当提到作为赫尔密寺财务主管(phyag-mdzod)的布坚(dbu-rgyan)于1776年访问了扎什伦布寺^[47]。

1782年5月初5(西历6月17日)次旺南杰让位后,他的大儿子次旦南杰(tshe-brtan-rnam-rgyal)在瓦木勒(wam-le)登基^[48]。即位之前有一个正式的协议(bcad-khra),内容包括序言和十四个段落,其中规定了退位国王的地位及其生活来源,并为现在及以后制定了规则以防滥用职权。它经米旁、次旦南杰、财务主管、次仁班觉(tshe-ring-dpal-vbyor)、大臣阿旺和拉达克、普里格、努布拉及确尔白(vchor-vbad)等地的显赫人物签名盖印^[49]。

新国王就任之初,通常对前任国王所授予他的权利和特权加以确认,或以颁发新文书的形式加以确认^[50]。我们尚不清楚此次采用协议的办法只是一个特例还是国王更替时的通常做法。

大约生于1779年的次旦南杰还是一个孩子,至少到1794年他还没有皇室封号,而是被称为“拉色(lha-sras)”^[51]。

这一时期与巴尔蒂首领之间冲突不断。1785年希噶尔(shi-sgar)和斯卡尔杜向拉达克宣战,他们向战场投入大量的兵力,并在巴拉噶(bal-aghara/brag-dkar)修筑了一座堡垒。他们迅速占据了吉仁和库仁城堡,并准备向卡普鲁的首领发动进攻。按照通常惯例,卡普鲁首领马哈木德·阿里·汗^[52]和他的儿子请求拉达克立即给予援助。这一次拉达克的军队绕道努布拉实施干预行动,努布拉的诺诺索南诺布(no-no bsod-nams-no-bu)和“小诺诺(little no-no)”从努布拉河两岸向前推进,还收编了确尔白的军队。他们前进到哲古尼(vdre-go-ni/dowani,即卡普鲁西北),遭遇敌军,在那里击败敌人,用八十人占领了城堡^[53]。我们可以猜想此后巴尔蒂人撤退了。

1792年希噶尔首领阿扎姆·汗(avzam khan)^[54]请求拉达克国王帮助他们抵抗瓦齐尔麻麻苏丹(wazir ma-ma sultan)。国王派噶贡伦次旺顿珠(bkavi-gung-blon tshe-dbang-don-grub)率军前往,其中有普里格的军队参加。然而先锋队部队据称由于炎热的气候和高水位而被拖延,与此同时,诺诺丹增伦珠(no-no bstan-vdzin-lhun-grub)和两个低级官员尽力使双方和解,尽管困难重重,但最终取得了成功,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55]。

根据穆内寺(mu-ne)寺的颂词记载,在该王统治时期,库鲁(kulu)军队侵略桑噶,并摧毁了一些寺庙^[56]。

几年后,次旦南杰获得了王室头衔。据《拉达克王统史》记载,“次旺南杰去世后,赫尔密寺恰贡嘉色(skyabs-mgon rgyal-sras/mi-pham)和贵族们举行了一次会议。他们要求王子次旦南杰从布仁(bu-rig)的帕炯(pa-skyum)娶了一位新娘^[57],并授予他王权”^[58]。他的兄弟次贝南杰(tshe-dpal-rnam-rgyal)在赫尔密剃度出家,他的同父异母兄弟晋美南杰在赤色寺接受神谕^[59]。他的三个同父异母姐妹,一个嫁给了帕炯的首领,另一个嫁给了诺诺次旺顿珠(no-no tshe-dbang-don-grub),第三个隐居寺院并在那里去世^[60]。

年轻的国王接受了精心的培养。他精通军事艺术、文学和书法。他减轻赋税,深得人民的爱戴^[61]。

拉达克与拉萨的官方关系仍然维持着,尽管在卫藏地区的文献中很少有这方面的信息。在1784年,西藏首府接待了一个由阿里首领散佩坚(mngav-ris vgo-pa bsam-vphel-can)带领的二十多人组成的使团^[62]。

更为重要的是邀请第八世竹钦活佛贡色却吉囊瓦(vbrug-chen kun-gzigs-chos-kyi-s nang-ba, 1768-1822)^[63]。1797年,每三年一次的年礼使团已经给竹钦活佛带去了国王及其喇嘛兄弟和诺诺贝杰(no-no dpal-rgyas,显然是一位官员)的信件^[64]。后来在1799年,国王又派一个私人使者恰多次仁

(phyag-rdor-tshe-ring)前往,他的请求得到了达赖喇嘛的赞同和支持。当竹钦活佛准备动身时,第十四世噶玛巴却反对他立即出发^[65]。最终他于1801年5月才开始了他的旅程,并在途中访问了冈底斯山。在那里他遇见了赫尔密寺的财务主管扎西(bkra-shis)和王室官员诺诺彭措热丹(no-no-phun-tshogs-rab-brtan)^[66]。在喀觉尔(kha-sbyor,瓦木勒附近?)他遇到了国王的兄弟次贝南杰。1801年9月初3(西历10月10日)他到达赫尔密寺,在那里受到国王和噶伦的接待,他从那里继续前往向列城^[67]。他发现在拉达克受到的接待是最慷慨的,国王和大臣们竞相赠送贵重的礼物,《拉达克王统史》中列出了这些礼物的清单^[68]。正在这时,流行性天花爆发,年轻的国王成为疫病的受害者。竹钦活佛为他主持了隆重的葬礼,随后于1802年1月或2月,竹钦活佛离开拉达克返回西藏^[69]。

我们顺便提一下竹钦活佛对他的拉达克门徒在精神需求上给予的照料。在他的文集kha函中,有十四篇短小的《上师瑜伽法》(bla-mavi-mal-vbyor)。写于1796年的一篇强调是为诺诺米旁桑丹(no-no-mi-dbang-bsam-gtan)而作,另一篇是为拉达克的使者恰多次仁而作,第三篇是为拉达克的王后摄政(sa-skyong-rgyal-mo)次旺仁增卓玛(tshe-dbang-rig-vdzin-sgrlo-ma)而作,次旺仁增卓玛好像是次旦南杰遗孀的另一个(最初的?)名字。

在该王统治时期有两位首相。起初由阿旺(这是缩写形式,其全称无处可寻)掌管公务。他第一次露面是在1759年领导人之一率军队抵抗巴尔蒂人的侵略,那时他仅被简单地称为诺诺(no-no)^[70]。在大起义和1782年协议签订的时候,他已经成为官员。他也是1794年2月15日(西历3月16日)文书(迪特·舒《卫藏、拉达克以及桑噶的文件及往来信函》LXXIX)的发起人之一。一份努布拉的题文(F.83)中把他称为曲伦钦波噶噶阿旺(chos-blon chen-po ga-ga ngag-dbang),与带有全部王家名号的次旦南杰在一起,这就意味着直到1794年他仍保有官职。

另一位首相是次旺顿珠(tshe-dbang-don-grub),他注定有一个漫长的职业生涯。他的父亲是次旺贝帕(tshe-dbang-dpal-vbar)^[71],在1760年次旺南杰和大臣贡觉(kun-skyob)时期的一本书的眉批(logs-bris)中提到了他^[72]。1775年他成为财务主管^[73]。次旺顿珠的第一次出现是在靠近列城的强巴(byams-pa)出土的一本尚未刊布题文(F.211)中,其中称噶伦次旺顿珠和他的母亲白玛玉珍(pad-ma-g.yu-sgrom)为噶伦次旺贡波(bkav-blon tshe-dbang-mgon-po)的葬礼提供了数尊造像,噶伦次旺贡波可能是次旺贝帕的另一个名字或是他的兄弟。1792年,与巴尔蒂斯坦交战时,他仍然是噶伦,甚至到1794年他还是上文已经引述过的文

书(迪特·舒《卫藏、拉达克以及桑噶的文件及往来信函》LXXIX)的倡导者之一,他只是被称为诺诺。在那个世纪末,他与国王的同父异母妹妹结婚,并成为了首相,为此,他出现在两份文献题文中(F.82和死后才有的F.117)。但是他的大部分活动都属于于下一个国王的统治时期。

如上所述,次旦南杰死于1802年初,身后留下一个女儿,并无儿子,当时他仅仅二十四岁^[74]。

在年轻的国王逝世后,他的更年轻的弟弟次贝米居顿珠南杰“被迫放弃僧人(身份)而被授予王权”^[75]。他的全名通常被简称为次贝南杰或顿珠南杰(don-grub-rnam-rgyal)。

在此我们同样首先提供一个由他颁发的众多文书的目录。

1、1803年11月5日(西历12月29日)应贡伦次旺顿珠的请求为国王的养兄弟(vo-ma-gci-pa,即由父母领养的兄弟-译者)玉杰索南丹增(gyul-rgyal-bsod-nams-bstan-vdzin)用兰杂(Lantsha characters,即天成体)为噶噶次旦南杰多杰米居旺格德(ga-ga tshe-brtan-rnam-rgyal-rdo-rje-mi-vgyur-dbang-gi-sde)雕刻了系列的六字真言(om-mani-padme-hum)而颁发的文书。(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文献,11/6)

2、1804年11月1日(西历12月3日)为同一人颁发的文书。1803年作为使者被派往喀什米尔,他从那里为国王带回一块封地(jagr),价值1000凯钦(khal-chen)(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文献,11/7)

3、1809年为特许土地以与列城伦波达珍南杰(blon-po rta-mgrin-rnam-rgyal)原先的土地进行交换的文书。(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文献,11/1)

4、1810年在卡拉则(kha-la-rtse)应噶贡伦次旺顿珠的请求为卡拉则的扎雪贡噶(drag-shos kun-dgav)颁发的文书,特许他灌溉用水,以奖励他在希噶尔遭到斯卡尔杜的阿哈迈德汗包围时所提供的服务。(富兰克《印藏古物》第一卷,1907年,609-611页刊布)

5、1810年为桑噶的栋德寺(stong-sde)颁发的特许免税的文书。(迪特·舒《卫藏、拉达克以及桑噶的文件及往来信函》LXXXVIII)

6、1811年7月初4(西历8月23日)颁发给栋德寺的文书,确认上述权利并禁止向该寺收税。(迪特·舒《卫藏、拉达克以及桑噶的文件及往来信函》LXXXIX)

7、1812年颁发给岗翁寺(sgang-sngon)的文书,同意噶佐次旺顿珠(bkav-mdzod tshe-dbang-don-grub)将阿吉纳塘岗(a-ci-na-thang-sgang)领地作为礼物赠送给该寺院。(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文献,

11/4)

8、1817年颁发给阿吉伦波(a-lci-blon-po)的文书,确认此前已送交的裁决书。(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文献,11)

9、1817年5月应次旺顿珠的请求,为洪达尔(hun-dar)囊索索南丹增(nang-so-bsod-nams-bstan-vdzin)颁发的文书,以奖励他在与巴尔蒂人的战争中提供的服务。(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文献,11/9;其中的主体部分已由富兰克在《西藏古物》第二卷中刊布,1926年,第236-241页)

10、火牛年12月初6(西历1818年1月12日)为谢赫的囊索次仁(tshe-rin)颁发的文书,对他和他父亲的公务工作表示认可。(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文献,11/2)

11、1819年3月20日(西历4月25日)绒帕(rum-bag)的姜商巴(lcang-srung-ba)颁发的文书,以奖励他在森林管理方面做出的贡献。(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文献,11/3)

12、1822年2月初5(西历3月27日)颁发的文书,同意由拉达克的长老对夏拉(shar-ra)夏俄(shar-ngos)和普孜(phug-rtse)之间诉讼案的裁决(迪特·舒《卫藏、拉达克以及桑噶的文件及往来信函》,LIII)

13、1823年为确尔白的木匠穆罕默德(muhammad)颁发的文书,涉及对由确尔白的阿里辛格(ali singh)所建桥梁的控制,以及其他各种服务。(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文献,11/5)

14、1825年为养兄顿珠次仁颁发的文书,特许一块领地以交换另一块领地,以在列城附近修筑索玛曼栋(so-ma-man-gdong)。(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文献,11/8)

15、1827年颁发的文书,禁止意古(dbyi-gu)的贵族家庭以朗阔巴(glang-vkhor-ba)即赤色寺的仆人为借口收税。(迪特·舒《卫藏、拉达克以及桑噶的文件及往来信函》,LII)

16、1832年8月25日(西历9月31日)为谢赫寺、赤色寺颁发的文书,确认原先的特权。(迪特·舒《卫藏、拉达克以及桑噶的文件及往来信函》,LI)

17、1840年8月颁发的文书,签名认可谢(shel)地森康(gzim-khang)家族承诺将一个女儿嫁给噶厦(dkar-zhva)的康萨康(khang-gsar-khang)家族。(迪特·舒《卫藏、拉达克以及桑噶的文件及往来信函》,LXXVI)

在次贝南杰统治的大部分时期,主要人物还是他的姐夫兼首相次旺顿珠(tshe-dbang-don-grub),他“像一个母亲一样把王国带向繁荣和美好”^[76]。他还全权独揽财政大臣(phyag-mdzod)^[77]职位,这使他能够控制国家的经济。据可靠资料证明,在1812年,噶伦“是最高权力的完美主人,而王(raja)却不

理政务”^[78]。

对外关系与以往一样与巴尔蒂人依然存在冲突。1804年穆罕默德·苏丹(muhammad sultan)带领巴尔蒂军队占领了希噶尔,次旺顿珠号召全国并组织远征军进行反抗^[79]。在拉达克的军队取得了一次战役的胜利后,诺诺索南丹增(no-no-bsod-nams-bstan-vdzin)娴熟地主持谈判,结果在以后的几年里,希噶尔被迫向拉达克人开放,同时瓦齐尔呈送人质。^[80]1806年次旺顿珠和诺诺旺扎(no-no dbang-drag)包围了被巴尔蒂卫队占领的纳尔(nar)城堡。索南丹增又一次处理了该事件,以灵巧的外交政策,成功地让斯卡尔杜的统治者阿赫马德·沙(ahmad shah)和希噶尔的瓦齐尔投降^[81]。

1810年国王在卡拉则颁布的一份文书中涉及希噶尔被阿赫马德·沙包围投降的事件,这是由扎雪贡噶(drag-shos kun-dgav)所引发的^[82]。

1811年再次遭到巴尔蒂人的进攻,诺诺旺扎和贝杰(dpal-rgyas)带领拉达克的部队前往卡普鲁,战役在索南丹增(bsod-nams-bstan-vdzin)的领导下以胜利告终,他接受了库若(ku-ro)的瓦利(wali)的效忠和尊崇^[83]。但是这次成功并没有使巴尔蒂边境保持和平。1812年由于卡普鲁的领导权问题,纷争再起。卡普鲁的首领叶赫雅汗(yahya khan)去世后,他的小儿子倒刺特·阿里汗(daulat ali khan)遭到同父异母兄弟、由一位信奉喇嘛教的妇女所生的众阿贡(a-rgon)的反对^[84]。诺诺丹珍扎西杜均(no-no rta-mgrin-bkra-shis-bdud-vjoms)和索南丹增被派去将他们隔开,最终他们将阿贡兄弟们安顿在一块领地上,拉达克从而获得了倒刺特·阿里·汗的效忠^[85]。

1815年因为阿赫马德·沙占领吉仁城堡而再次发生了冲突。谢赫的大臣诺诺达珍南杰(no-no rta-mgrin-rnam-rgyal)被任命为拉达克军队的指挥官。巴尔蒂人被诺诺索南丹增指挥的先头部队击败,阿赫马德·沙求和。不久,他便破坏了和平,抓获了一百多名拉达克人。索南丹增与他们进行了三个月的协商,他们释放了所抓的人员^[86]。这次事件在巴尔蒂人看来,整个拉达克军队都成为他们的俘虏^[87]。正如俗语所说,“没有绝对的真相”。

通过对这些事件的描述,我们可以推断次旺顿珠掌握着政治权力,但在1806年后,却停止了对军队的指挥。那项任务被正式委任给了索南丹增,也就是通常所称的诺诺丹增(no-no bstan-vdzin),他与其说是一位成功的将军,不如说是一位更出色的谈判者。有关他的文献显示,他是栋木拉(ldum-ra/nubra)的囊索,在奴布拉的洪达尔(hun-dar)发现的题文(F.85)中称之为喀本丹增([m]khar-[d]pon bstan-vdzin),莫尔克罗夫特称之为喀噶丹增(khaga tanzin),说他是次旺顿珠的姐夫,是努布拉最大的地主^[88],也是次丹(tshe-brtan)在描述道格拉(dogra)战争时提到的努布拉的噶噶丹增

(ga-ga bstan-vdzin)^[89]。他是一个出色的官员,但却没有成为大臣。

与西部地区穆斯林首领的关系受到一件重大事件的影响,以致拉达克的经济受到制约,进而影响其政治生活。1819年兰吉特·辛格(ranjit singh)占领了克什米尔。新扩张的锡克国家(sikh state)与懒散的阿富汗相比是一个危险的邻居。就在兼并之后不久,兰吉特·辛格派使者到拉达克,要求享受迄今为止一直给阿富汗的进贡和礼物,国王毫不犹豫地接受了。1820年10月,国王(maharaja)的使者再次来到拉达克落实贡物数额。看起来一直到1834年,拉达克或多或少定期向克什米尔的锡克统治者进贡^[90]。

这种新关系导致某种变化,这种变化在1821年6月一股巴尔蒂人的入侵引起次旺顿珠作出军事准备时突出地表现出来^[91]。尽管此次事件的后果微不足道,那年末或1822年初,首相向克什米尔的锡克统治者报告,说拉达克正遭到斯卡尔杜的统治者阿赫马德·沙的入侵,如果有必要,他将寻求援助^[92]。显然入侵事件根本没有发生,危险也已经渡过,但是,现在拉达克的自我防御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制于锡克的同意和帮助。这可能就是如我们所知的,当1825年阿赫马德·沙入侵希噶、吉仁以及拉达克的旧盟友卡普鲁时^[93],拉达克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的原因。

这样,拉达克进入了锡克王国的政治轨道。兰吉特·辛格并不乐意兼并一个如此贫穷的国家,但是他妒忌地观察着并反对任何来自其他方面的干涉。对待威廉姆·莫尔克罗夫特(william moorcroft)就是一个例子。威廉姆·莫尔克罗夫特于1820年到达列城,试图劝诱拉达克接受大英帝国的影响。虽然没有来自加尔各答政府的权威,他向国王提出受大英帝国的保护,并且还为此拟定一个协议草案。1821年7月30日,国王(通常的形式是“阿迄巴特马赫木德汗”‘Āqibat Mahmūd Khān)派一名忠诚的仆人在一个纪念碑外型中夹带着协议方案。而与此同时,兰吉特·辛格向英国政府正式提出抗议,反对莫尔克罗夫特的行为,总督不希望冒犯锡克统治者,于是拒绝了提议并否认莫尔克罗夫特^[94]。然而这并没有损害英国旅行者与国王及首相之间总体上友善的关系。

另一次由现代藏学的创始人乔玛(alexander csoma de körös/körös csoma sándor)访问,虽没有政治含义却在文化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没有留下有关他旅程的记述。仅仅根据他于1825年1月28日(安息日)给孟加拉政府的信,我们可以推测如下事实。1822年6月9日,他到达列城,在那里待了二十五天。然后他返回了克什米尔,但是在德拉斯他遇见了莫尔克罗夫特,并同意和他一起返回列城。8月26日他们到达列城。当这个英国人一离开,他为

了学习语言,就和特里贝克(trebeck)呆在列城。进入冬天时,他们两人又返回克什米尔。后来,由于莫尔克罗夫特的供给并举荐,他返回列城(1823年6月1日),受到首相的友好接待,并将他推荐给了在桑噶桑拉的喇嘛。于是他立即离开那里去了桑噶,从1823年6月20日到1824年10月22日,他一直待在那里^[95]。

如果说巴尔蒂总体上平静的话,在南方则出现了一系列的纷争。由于长期的商业争议,1822年,一伙来自库鲁的武装分子侵入司丕底(spiti),蹂躏百姓,当地人民呼吁进行报复,但是国王无能力也不愿意帮助他的不幸的臣民^[96]。后来库鲁的武装分子再次进攻,侵袭了库纳瓦尔(kunawar)和拉合尔,在桑噶大肆掠夺^[97]。大约在1825年帕达尔(padar)的统治者,昌巴(chamba)的王拉坦谢尔汗(ratan sher khan/ratanu)入侵桑噶并从谷地征收贡品,国王再次拒绝提供帮助,并把责任归咎于当地首领^[98]。最终一股来自曼迪(mandi)和瓦德万(wardwan)的势力进入桑噶,并将它洗劫一空^[99]。

所有这些骚动部分是由于山地国家的动荡引起的。首先是康格拉(kangra)的王桑萨尔·阐德(sansar chand)的动乱行为,接着是廓尔喀(gorkha)的入侵,最后是兰吉特·辛格的征服。但是它也透露出了拉达克日趋衰弱的迹象。

与西藏和中国的关系还不是那么令人伤痛。德钦曲阔寺荣增益喜竹巴(bde-chen-chos-vkhor yongs-vdzin ye-shes-grub-pa/1781-1845)接受了国王的邀请并踏上了前往拉达克的旅途。此事发生在1814年,因为在那一年,达赖喇嘛向德钦曲阔活佛、拉达克国王的使者们以及赫尔密寺大金刚师(slob-dpon chen-po)的管理人员(mdzod-pa,可能是我们后面将提到的贡波/mgon-po)祝福旅途愉快^[100]。荣增受到了热情接待,国王、大臣和臣民们都竞相给他送去贵重的礼物,杰尊达热(rje-btsum ta-re)为此准备了一个清单。他甚至成功地说服了克什米尔的一些穆斯林皈依喇嘛教。在那里生活了三年后,他返回了西藏^[101]。

1817年,赫尔密寺的强佐贡波又一次邀请第八世竹钦活佛,这次未获答应,没有提供拒绝的理由^[102]。1831年,较次要的转世恰域(bya-yul)密宗院的活佛(sngags-grwa sprul-sku)从拉达克返回西藏^[103]。

1826年8月大臣索朗顿珠(bsod-nams-don-grub)从拉达克前往拉萨访问^[104]。拉达克国王派往西藏首都的另一位特殊使者是阿赫马德汗(ahmad khan),带着十七个随从^[105]。他可能是一位穆斯林商人,这时已经垄断了年礼(lo-phyag)使团。

这一外交沟通的恢复与当代中亚地区的事件密切相关,这使拉达克抽到了最后一次进入清朝政治视野的签。1826年,流亡到浩罕的和卓家族的后裔张格尔(jehangir)企图重新获得先祖对喀什噶尔

的统治。他的第一次尝试取得了短暂的成功。第二次尝试以他落入中国人之手而告终(1828年2月14日)^[106]。他的一些随从,大约有1000多人和700匹马在浩罕王子阿布都斯撒它尔(abdus-sattar)的带领下逃往拉达克(1828年)。经过四个半月的艰难旅程,他们到达了沙约克(shayok)山谷,只剩下300人和200-300匹马,完全穷困潦倒。他们在当地得到了帮助,每人得到了1卢比。国王写信给章孜(brang-rtse/tankse)的指挥官(mkhar-dpon)索南达杰(bsod-nams-dar-rgyas),命令他送这些人前来。十一天后,他们到达了列城,并得到了食物和草料。国王视其首领为外国元首而给予尊敬。他们表达了希望到麦加(mecca)朝圣,或留在国王期望安置他们的地方的愿望。阿布都斯撒它尔被安顿在赫尔密拉章(he-mis bla-brang),即赫尔密寺主持在列城的居所^[107]。

很快,此事便导致了政治上的困境。拉达克必须避免伤害清朝人的情感,因为与突厥斯坦(turkestan)和西藏的转口贸易对国家经济至关重要。在清朝再次收回了叶尔羌后,国王在我们已经熟知的奴布拉的大臣噶噶丹增的建议下,向清朝的指挥官写信表示祝贺,并告知拉达克有流亡者。三个半月后收到回信,要求国王移交流亡者。一个半月后,叶尔羌的Ambans派遣两个伯克访问列城,他们作为国王的客人在那里逗留一些日子。后来由于一些不明原因,这一事件的处理权转移到了拉萨的驻藏大臣手里,他于1828年3月派遣噶伦夏扎顿珠多杰(bshad-sgra don-grub-rdo-rje)前往拉达克去解决叛乱者的引渡问题。阿布都斯撒它尔及其同党被逮捕并连锁着交了出来。他们被带到西藏,不久从日土城(ru-thog-mkhar)传来消息说那些不幸的人在达赖喇嘛知道此事之前被清朝人杀害了^[108]。事实上,中国和拉达克之间就确切的人数还存在着一些争议,一百多人被逮捕(显然允许其余的人失踪),45人逃脱,19人病死,24人即刻被移交,随后又交送14人。国王被授予五品顶戴花翎,赏给拉达克较低级的首领萨莫(sa-mo?)金顶蓝翎。夏扎在圆满完成任务后,于10月份返回了西藏^[109]。

这些令人不齿的事件让国王感到不安,主要因为在逮捕那些难民时,这些悲痛的难民放言威胁并诅咒国王和他的儿子将得天花而死。所以国王以发放布施(每个月的15和30日都给穆斯林贫民提供15卢比)、请达赖喇嘛祈祷以及固定的禳灾辟邪仪式来阻止恶兆。^[110]

为了使整个事情圆满,1829年初,拉达克派遣使者带着少量的礼物前往拉萨,将从那里转赴北京。这引起了官僚程序上的困难,因为拉达克并未被纳入帝国朝贡者行列,但是礼物还是被作为特例接收了^[111]。

此时几乎可以肯定次旺顿珠已经去世了,因为

在突厥流亡者事件中没有提到他,如果他还健在肯定会被提到。我推测他大约死于1825年。在整个一代人期间都是由他管理拉达克,他在五十四岁时去世^[112]。就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对他是否是一位称职的政治家还很难作出评价。莫尔克罗夫特认为他具有敏锐的判断能力,但容易受到周围人的影响^[113]。但不管怎样,“国政皆出首相之手,国王不过有同于无”^[114]。

次旺顿珠的去世造成了剧烈的变化,“国政陷入一片混乱”^[115]。显然国王沉醉于在失去权力多年后又重新获得自由。但是他的反应极其不幸,他的性格似乎显现出一种从他的父亲次旺南杰那里遗传下来的痕迹。他变得刚愎自用,腐败而暴虐。“他不接受从前任命的官员,国王自己执掌首相之印,与头人贡巴(mgon-pa)等新型的官员商议,贵族家庭被冷落,桑噶的国王、普里格的噶伦以及其他一些人都被关进了拉达克的监狱。和他站在一个立场上的新官员被任命为地区指挥官,各地古老的优良习俗都遭到破坏”^[116]。撇开压迫、低效率和不尊重旧贵族,新局势的主要特点是废除还是保留首相职位。国王想自己出任首相,事实上,直到王国终结,首相的职位都空缺着。这就很难形成有效的管理。

显然,次旺南杰只娶过一个妻子,她是兄弟次旦南杰的遗孀,一位来自帕炯的妇女^[117]。《拉达克王统史》中她被称为司司喀顿(zi-zi-khatun)。她生了一个女儿叫比琼(bhil-cuhng),后来(大约在1810年)生了一个儿子叫次旺热丹南杰(tshe-dbang-rab-brtan-rnam-rgyal)^[118]。关于这个王子的信息分散在《拉达克王统史》的各个部分,几乎无法归类。文本极为紊乱,我只是根据逻辑对其要素进行了重新安排。

起初王子在宫里过着安逸恬静的生活^[119]。之后,资料显示,木牛年第五世荣增益西竹巴写信宣布小王子是赫尔密寺比巴多杰(bhil-ba-rdo-rje)的一个转世灵童^[120]。木牛年应该是1805年,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莫尔克罗夫特在那里时王子并不是转世灵童。时间可能应该修正为土牛年(1829年)。尽管有些勉强,他的母亲还是试图为他安排一桩与卫藏东南部的从赞普时代传承下来的、西藏最显贵的五个家族之一的拉嘉里(lha-rgya-ri)家族一位姑娘的婚姻。为了这个目的,囊伦诺诺彭措热丹(nang-blon no-no-phun-tshogs-rab-brtan)与年礼使团一起前往拉萨,然而婚事商谈因为该臣在西藏去世而未能实现^[121]。

小王子现在以“确智(mchog-sprul/高级转世)”之号闻名,他的办公地点在赫尔密寺和杰哲。事实上,由于她的母亲影响力不敌财务主管索南旺楚(bsod-nams-dbang-phyug),因此他宁愿和母亲一起周游国家。但是王权继承问题变得日益紧迫,他是王朝最后的子嗣。作为一个仁增(rig-vdzin)即过着

宗教生活的俗人,他并没有义务坚守独身。这样,强佐贡波(phyag-mdzod mgon-po)前往西藏寻求竹钦活佛的帮助,由于竹钦活佛的建议,以及国王、首相和阿杂亚(Ācarya)即第四世赫尔密活佛坚持^[122],最终成功地说服了他。大约在1830年^[123],他娶后来的首相次旺顿珠的小女儿格桑卓玛(bskal-dzang sgol-ma)为妻,格桑卓玛于1835年9月15日(西历11月5日)为其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晋美曲吉森格米居贡噶南杰(vjigs-med-chos-kyi-seng-ge mi-vgyur kun-dgav-rnam-rgyal)。同年,“确智”又娶了普里格帕炯的姑娘尊莫索南贝吉(btsun-mo bsod-nams-dpal-skyid)和一位穆斯林姑娘雪热喀顿(zö-ra khatun)。她们中的一个被称为司喀顿的,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叫丹松域杰(bstan-srung-g. yul-rgyal)^[124]。

王子地位的这一变化致使其父子感情日益疏远,最终导致了政治变革。根据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第505页,次贝南杰于1830年让位于他的儿子。没有引用权威证据,《拉达克王统史》对此主题保持沉默。然而事实是19世纪30年代初,“确智”继任王位,即使在英国统治者面前他仍然是君主。

次贝南杰的长期统治兆示着皇家资助宗教艺术的最后华光。国王从事宏伟而昂贵的事业,诸如托格的新宫殿,巨型金刚持(vajrapāṇi)像,整个头部都用黄金和铜打造,银的佛塔并在末端镶以金饰等等。在水虎年时,他在列城的特钦贡玛(theq-chen-gong-ma)大殿筑立一尊白玛沃巴(padma-vod-vbar)像,花费了13巴(bars/rdo-tshad,相当于1.6千克)的白银。其他的纯银塑像都建在谢赫和托格的宫殿中^[125]。

[注释及参考文献]

[1]见上文第107页。

[2]见上文文献6。

[3]实际上达赖喇嘛圆寂于2月初3(西历1757年3月22日),因此,这里就出现了错误,或者是因为历法上的区别。同年,拉达克王派遣吊唁使团前往拉萨。见《第七世达赖喇嘛传》,544a。

[4]古丹(M. Coutant)《17-18世纪的中亚》(L'Asie Centrale aus X^e et X^e siècles),利翁-巴黎(Lyon-Paris),1912,第116-118页(主要根据《东华录》)。埃希霍恩(W. Eichhorn)《乾隆时期中国人在突厥斯坦的殖民斗争》(Kolonialkämpfe der Chinesen in Turkestan Während der Periode Ch'ien-lung),ZDMG 1942,第282-287页。(译自《圣武记》,早期的译文出自维西埃尔(A. Vissière),载《穆斯林世界杂志》(Revue du Mond Musulman),11,1910年,378-386页)。佐口透(Saguchi Toru)《满族征服后喀什噶尔和卓家族的宗谱》(The Genealogy of the house Khwaja of Kashgar after the Manchurian conquest),载《东洋学报》(Tōyō Gakuhō),42(1959/60),375-376页。

[5]《高宗实录》,577.30a-b。

[6]《高宗实录》,578.9a-10a。

[7]古丹《17-18世纪的中亚》,119-121页。埃希霍恩《乾隆时期中国人在突厥斯坦的殖民斗争》,313-314页。乾隆皇帝有关此事的三份圣旨由维西埃尔译出,387-389页。

[8]《高宗实录》,592.19b,599.26a-28a。

[9]加木样索巴《第六世班禅罗桑贝丹益喜传》,第178a、179a。

[10]《高宗实录》,602.10a-b。

[11]坎宁安姆《拉达克 地理、统计与历史》,第33页。希噶尔首领世系表 n.24 时间有错。

[12]坎宁安姆《拉达克 地理、统计与历史》,第35页。斯卡尔杜统治者世系表 n.6。

[13]坎宁安姆《拉达克 地理、统计与历史》,第32页。吉仁首领世系表 n.7。但是,也许拉达克的文献将 Mir beg 和他的继任者 Mirza beg n.8 弄错了。

[14]坎宁安姆《拉达克 地理、统计与历史》,第31页。卡普鲁首领世系表, n.65。时间错了半个世纪。

[15]对这次战役仅有的描述见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475-476页。文献4、5、12支持这一说法(见上文111页)。

[16]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476页。

[17]《拉达克王统史》,46.5-9。富兰克在122页的译文应该纠正如下:“他的行为史无前例,怪异而奇特。他有500匹提皮甲克(ti-pi-cag)马,每一匹马都需要一个马夫和一盏灯。为了使它们的步伐更加完美,所有提皮甲克马的蹄子、它们的食物等都需要特别的照料”。

[18]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477-478页。根据《拉达克王统史》46.9,她只是被简单地废黜并监禁。

[19]见丹增布赤1764年在穆贝颁发给噶伦旺杰的文书(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文献,6/1),次旺南杰的第8号文书(见上文111页)。

[20]《第八世达赖喇嘛传》,59a。

[21]一份题文(F. 78)曾赞颂曲伦次丹旺杰(chos-blon tshe-brtan-dbang-rgyal)“对敌人比火焰还要猛烈,对臣民比父母还要慈祥”。

[22]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479页。此事在文本中记载得模糊和重复,国王向赤色寺的主持颁发特许权,以表达在他处于半囚禁的时期主持给予他善待的感激之情。在次旺南杰第11号文书(见上文112页)。

[23]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481页。

[24]次旺南杰的第18号文书(见上文112页)。

[25]潘尼施(C.K. Panish)《拉达克的货币》(The Coinage of Ladakh),载《美国钱币学》(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博物馆考》(Museum Notes)16(1970),185-186页。

[26]列宁格勒的库兹涅左夫(Kuznetsov)教授友好地向我指出艾福瑞莫夫的记载1786年在圣彼得堡出版,《俄罗斯之星》(Ruskaja Starina),7(1893年),第125-149页进行了重编。我未能得到任何的版本,我只是使用了斯文赫定(S. Hedin)在《藏南》(Southern Tibet)第7卷中的第二手资料,莱比锡,1922年,107-109页。

[27]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488-489页。

[28]《拉达克王统史》,第46.3-5。

[29]《拉达克王统史》,第46.8-13。

[30]赫尔密寺题文。

[31]贝洛·次旺贡钦《司徒班钦自传及日记》,第220b、369b。

[32]加木样索巴《第六世班禅罗桑贝丹益喜传》,226a、227a-

- b. 关于恰域地区以及该地寺院名称参见威利(T.V. Wylie)《〈世界广说〉与西藏地理学》(the geography of Tibet according to the vdzam-gling-rgyas-bshad), 1962 年, 罗马, 第 174 页, n.554。
- [33]加木样索巴《第六世班禅罗桑贝丹益喜传》, 269b、273a。
- [34]《第八世达赖喇嘛传》, 第 56b。
- [35]加木样索巴《第六世班禅罗桑贝丹益喜传》, 286b、288b。
- [36]1740 年, 他的父亲被班禅认做精神上的兄弟。加木样索巴《第六世班禅罗桑贝丹益喜传》, 21b。
- [37]加木样索巴《第六世班禅罗桑贝丹益喜传》, 291a-b。
- [38]加木样索巴《第六世班禅罗桑贝丹益喜传》, 74a。
- [39]施拉克因特维特(E.v.Schlagintweit)《拉达克赫尔密寺藏文碑文》(Tibetische Inschrift aus dem Kloster He-mis in Ladakh), 巴伐利亚州科学院会议报告, 1864, II, 305-318 页。早先他只在《西藏佛教》(Buddhism in Tibet/ Leipzig-Longon, 1863 年)第 188-189 页中刊布了这个文本。我曾经在当地核对了题文, 发现施拉克因特维特的文本总体上很准确, 但是译文并不十分可靠, 有些人不能得到确认。其他题文我利用的都是图齐教授的 1930 年的抄本(eye-copy)。
- [40]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 489 页。第穆活佛(de-mo rin-po-che)《第九世达赖喇嘛隆多嘉措传》(rgyal bavi dbang po thams cad mkhyen pa blo bzang bstan pavi vbyung gnas ngag dbang lung rtogs rgya mtsho dpal bzang povi zhal snga nas kyi rnam par thar pa mdor mtshon pa dad pavi yid 'phrog), 107b。
- [41]目前的赫尔密活佛是第六世, 由此可推算出一个几乎不可能的平均高寿命, 我们必须考虑在转世的过程中存在一个或多个空白期。
- [42]加木样索巴《第六世班禅罗桑贝丹益喜传》, 290a。
- [43]《拉达克王统史》45.26-27。
- [44]加木样索巴《第六世班禅罗桑贝丹益喜传》, 227b, 249a。
- [45] 加木样索巴《第六世班禅罗桑贝丹益喜传》, 352 a, 363b。此前不久等待赐给法名(《第六世班禅罗桑贝丹益喜传》, 361b-362a)的“拉达克诺诺(la-dvags no-no)”肯定是另外一人。
- [46]加木样索巴《第六世班禅罗桑贝丹益喜传》, 3b, 63a。他可能就是 1788 年出现的格贵钦莫噶钦洛桑扎西(dge-bskos chen-mo dkav-chen blo-bzang-bkra-shis), 见《第七世班禅丹贝尼玛传》(rab 'byams rgyal bavi spyi dzugs skyabs mgon pan chen tham cad mkhyen pa rje btsun blo bzang dpal lden bstan pavi nyi ma phyogs las rnam rgyal dpal bzang povi zhal snga nas kyi sku gsung thugs kyi rnam par thar pa vdzam gling mdzes rgyan), 51 b。
- [47]加木样索巴《第六世班禅罗桑贝丹益喜传》, 372a。
- [48]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 483 页。
- [49]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 483-488 页, 玛尼与著作目录, n.16。
- [50] 我们知道有三份这样的文书, 它们都是在 1783 年颁发的: 1 赤色寺继续享有先前特许的许可(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 文书, 10/2)。2 迪特·舒《卫藏、拉达克以及桑噶的文件及往来信函》, LIV。3 1779 年给予阿里活佛特许的证明(次旦南杰的文书, n.16, 见上文 112 页)。
- [51] 这在一份文书(迪特·舒《卫藏、拉达克以及桑噶的文件及往来信函》(Urkunden und Sendscheiben aus Zentraltibet, Ladakh und Zanskar, LXXIX)和一份题文(F. 18)中得到体现。
- [52]坎宁罕姆《拉达克 地理、统计与历史》, 第 30 页, 卡普鲁王世系表, 第 65 页, 时间有误。
- [53]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 第 490-491 页, 文书, 10/5。
- [54]坎宁罕姆《拉达克 地理、统计与历史》, 第 33 页, 希噶尔王统实习表第 22 页, 时间有误。
- [55] 有关索南丹增(bsod-nams-bstan-vdzin)的文书, 载富兰克《印藏古物》第二卷, 第 236.1-11。索南丹增可能就是 1785 年的小诺诺。
- [56]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 第 492-493 页。
- [57]根据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 第 490 页, 她的名字叫贝洁旺姆(dpal-mdzes-dbang-mo)。
- [58]《拉达克王统史》46.13-16。奇怪的是, 在他去世不久颁发的一份文书中给出了他的全称, 但只有一个简单的称号“噶噶(ga-ga)”。见次贝顿珠南杰的文书 n. 1(见上文第 111 页)。
- [59]在次贝顿珠南杰(1802-1837)统治时期, 这位王子生活在贝土寺, 这出现在一份题文(F.86)中。1840 年他为兄弟举行了超度仪式。见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 第 550 页。
- [60]《拉达克王统史》46.19-22。富兰克关于最后一句的翻译有误。关于次旦南杰(及其兄弟)和帕炯首领穆罕迈德阿里汗(Muhammad Ali Khan)之间的双重关系, 参见米尔·伊萨特·乌拉赫(Mir Izzet Ullah)《外喜马拉雅旅行记》(Travel beyond the Himalayas), 第 287 页。
- [61]《拉达克王统史》46.22-30。
- [62]《第八世达赖喇嘛传》, 139a。
- [63] 富兰克在《拉达克王统史》中组合的涉及竹钦活佛的访问、次旦南杰统治时期概况等内容的段落是混乱的, 其中个别属于 Ms.B 和 C 版本中的部分应重新编排为: 46.15, 46.19-29, 46.1-19, 46.29-47.2。
- [64]《第八世竹钦活佛贡色却吉囊瓦(1768-1822)自传》(mi pham chos kyi snang ba rang nyid kyi rtogs brjod drang povi sa bon dam pavi chos kyi skal pa ji tsam nod pavi rim pa dang lhan cig nyes par brjod pa rab gsal snyan pavi rnga sgra), 第 401 页。YD5(作者文献目录中遗忘了此书的完整书名, 故存疑——译者, 下同), 8b-9a, 10b。
- [65]《第八世竹钦活佛贡色却吉囊瓦(1768-1822)自传》, 41b-42a。YD5, 301-b。
- [66] 在签订 1782 年协议时, 扎西已经掌管公务。见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 第 488 页。彭措热丹我们将在下文再次遇到。
- [67]《第八世竹钦活佛贡色却吉囊瓦(1768-1822)自传》, 45a-47a。
- [68]《拉达克王统史》46.15-19。
- [69]《拉达克王统史》46.30-47.2。《第八世竹钦活佛贡色却吉囊瓦(1768-1822)自传》, 47a。
- [70] 次旦南杰的文书 n.4, 见上文第 111 页。
- [71] 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 第 490 页。
- [72] 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 玛尼与著作目录, n. 15。
- [73] 次旺南杰的文书 n.10, 见上文第 112 页。
- [74]《拉达克王统史》47.1。根据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 第 491 页, 他去世时 33 岁, 这不大合理。
- [75]《拉达克王统史》, 47.3。
- [76]《拉达克王统史》46.6-7。

[77] 格爾甘《拉達克王統史——甘露藏》第 490 頁。在 1812 年的文書 n.7(見上文)和一份題文(F.88)中他也身負此職。

[78] 米爾·伊薩特·烏拉赫(Mir Izzet Ullah)《外喜馬拉雅旅行記》(Travel beyond the Himalayas)第 288 頁。該文獻提供了王的名字是 Chhatendruj,即 tshe[-dbang]-don-grub(次旺頓珠),應該是與首相弄混了。

[79] 坎寧罕姆《拉達克 地理、統計與歷史》,第 34 頁,希噶爾王統世系表 n.25。

[80] 文獻 9,見富蘭克《印藏古物》第二卷,第 236.12–237.13。譯文必須做如下修正 236.13–15——“一時,當噶佐(bkav-mdzod)在哈努等待時,噶噶多杰與諾諾丹增為了向瑪瑪蘇丹(ma-ma sul-dad)講述(面對面?)當時的情景,向他發出如下信件‘轉身看看你(的處境),你放棄自己的職位,魯莽地將斯卡爾杜的人民作為軍隊帶到這裡,這是不允許的,等等’。237.3–5——“之後噶噶多杰、諾諾丹增與我等之主人如獲勝之獵鷹,而當時猩紅色的斯卡爾杜人動作迅速,他們將普爾甲(phur-bcags)斯卡爾杜人撤回”。—237.6——“之後為根據季節保障供應的行動變得適宜,諾諾丹增”等。——237.8–10——“之後他呈送了包括金子、步槍和馬匹,以及阿布拉都(abdullah)的儿子,還有大臣達如(daru)達如被派往噶噶多杰處送交人質。諾諾丹增則留在該處作為調停人,瓦齊爾和囊追(nang-gros)以清楚的语言起誓”。

[81] 文獻 9,見富蘭克《印藏古物》第二卷,第 237.14–18。第 15–16 行文字的譯文必須修改如下“阿赫馬德·沙,斯卡爾杜的覺(jo),與希噶爾的首領瓦齊爾,他早先曾(在拉達克)做人質,現在消除冤仇,向噶佐恭敬獻上誓言,呈送人質”。

[82] 文獻 n.4,見上文 126 頁。

[83] 文獻 9,見富蘭克《印藏古物》第二卷,第 237.19–22。其中最後一句的翻譯有必要做如下修正:“庫若的瓦利被召喚前來從事服務性的工作”。這可能是指由 300 名鞑靼(dardis)人發動的災難性襲擊,1811 年他們從德拉斯(dras)到瑪塔延(matayan)使整個國家遭受極大損失,還抓走 250 人並出售為奴。見米爾·伊薩特·烏拉赫《外喜馬拉雅旅行記》286 頁。

[84] “在巴爾蒂斯坦一個人(男人或女人)的孩子是屬於一個當地首領家庭的,而一個人是屬於一個耕種者家庭的,稱為阿貢(argon)”,比亞素蒂(Biasutti),戴尼爾(Dainelli),《人種》(I tipi umani)(見《菲力丕意大利書信集》)(apedizione Italiana De Filippi),第二集,vol.x),博羅納(Bologna),1925,第 140 頁。在拉達克,該詞指穆斯林商人和當地婦女所生的孩子。參見勞弗爾(B. Laufer)《藏語中的借詞》(Loan-words in Tiptetan),載《通報》17 卷(1916 年),第 492–493 頁 n.173。

[85] 文獻 9,見富蘭克《印藏古物》第二卷,第 237.23–30。第 23–27 行應該翻譯成為:“水猴年(1812 年),因為“覺”亞赫雅汗去世,而倒刺特·阿里·汗仍年幼,他的阿貢們掀起數次糾紛,他們(或他?)到達卡普魯的一個地方。我們從這裡(即從列城)派諾諾達珍扎西杜均和諾諾丹增前去安置。他們在吉仁交換了(談判?)。他們將倒刺特·阿里·汗安置在托孜(mthog-rtse)城中并(告訴他):“遷移瓦齊爾的隨從(?)。我們)將集中阿貢和十二帕(pā?)的貴族,然後安排他們安居樂業,從此以後他們將受到拉達克王法令的約束,永不反叛”。(這些消息)傳遞給倒刺特·阿里·汗,他依言而行,并起誓效忠於拉達克,永不起一絲反叛之念。他給予堅定的保證,并頒布內外法令承擔清潔或不潔的各類任務。我們獲得

了成功(rgyal-kha)。大約 1820–1822 年,卡普魯再次處於斯卡爾杜阿赫馬德·沙的統治之下”。見莫爾克羅夫特《喜馬拉雅地區印度斯坦、旁遮普旅行記》第二卷,第 264–265 頁。亦見維格尼(Vigne)《卡什米爾、拉達克及依斯卡爾杜等地旅行記》(Travels in Kashmir, Ladak, Iskardo, etc.)第二卷,第 292,317–318 頁。

[86] 文獻 9,見富蘭克《印藏古物》第二卷,第 238.1–14。

[87] 維格尼《卡什米爾、拉達克及依斯卡爾杜等地旅行記》第二卷,251 頁。“我懷疑那里是否存在與顯然復活的喀什米爾宗主的聯繫:1813 年或稍後喀什米爾為拉達克鑄造貨幣,忍受了上面刻寫阿富汗國王馬赫木德沙(mahmud shah)的名字。潘尼什(C. K. Panish)《拉達克的錢幣》(the coinage of Ladakh),第 186 頁。

[88] 莫爾克羅夫特《喜馬拉雅地區印度斯坦、旁遮普旅行記》,第一卷,第 230 頁。一則相似的信息亦見於米爾·伊薩特·烏拉赫(Mir Izzet Ullah)《外喜馬拉雅旅行記》,第 295 頁。根據此書,噶噶是首相的岳父。這很難成立,因為索南丹增與次旺頓珠年歲相當。坎寧罕姆《莫爾克羅夫特拉達克旅行考》(Notes on Moorcroft's travels in Ladakh),載 JASB,13,1(1844),第 245 頁,對莫爾克羅夫特的《喜馬拉雅地區印度斯坦、旁遮普旅行記》,第一卷,第 334–335 頁進行了評論,認為作者錯誤地將丹增當成是那個時代的馴馬官邦喀巴(bang-kha-pa,邦喀是潔哲的周邊地區)。

[89] 富蘭克《印藏古物》第二卷,第 245.11。

[90] 達塔(C.L. Datta)《拉達克與西喜馬拉雅政治:1819–1848》,新德里,1973 年,81–82 頁。

[91] 莫爾克羅夫特《喜馬拉雅地區印度斯坦、旁遮普旅行記》,第一卷,412 頁。達塔《拉達克與西喜馬拉雅政治:1819–1848》,新德里,1973 年,70n。

[92] 達塔《拉達克與西喜馬拉雅政治:1819–1848》,新德里,1973 年,82 頁。

[93] 維格尼《卡什米爾、拉達克及依斯卡爾杜等地旅行記》第二卷,292 頁以及 317–318 頁。

[94] 《拉達克王統史》47.17–25。第 24 行的“dbyar-dgun thog-mnyis”並非“夏冬兩季”之意,而是指“兩個夏–冬”,即兩年之意。參見莫爾克羅夫特《喜馬拉雅地區印度斯坦、旁遮普旅行記》,第一卷,第 418–422 頁。達塔《拉達克與西喜馬拉雅政治:1819–1848》,新德里,1973 年,93–102 頁。紀念碑上的文字和協議草約文本見阿赫魯瓦里亞《拉達克與印度的關係》,第 3–6 頁。

[95] 杜卡(T. Duka)《喬瑪的生平與作品》(Life and works of Alexander Csoma de Körös),倫敦,1885 年,第 28–29 頁。

[96] 莫爾克羅夫特《喜馬拉雅地區印度斯坦、旁遮普旅行記》,第一卷,456–457 頁,以及第二卷,62–66 頁。《拉達克王統史》47.25–26。

[97] 《拉達克王統史》47.26–28。

[98] 《拉達克王統史》47.28–30。霍齊森、沃格爾《旁遮普山區邦國史》,第二卷,第 323 頁。戈茨(H. Goetz)《莫卧兒和錫克時代的昌姆巴歷史》(history of Chamba state in Mughal and Sikh times),載 JIH,31(1953),153 頁。

[99] 《拉達克王統史》47.30–48.1。

[100] 第穆活佛《第九世達賴喇嘛隆多嘉措傳》,159a。

[101] YD5,11a–b。

[102] 《第八世竹欽活佛貢色却吉囊瓦(1768–1822)自傳》,71a,第五世榮增活佛《第八世竹欽活佛貢色却吉囊瓦續傳》(rgyal dbang dam chos nyi mavi nam thar rab gsal snyan pavi

nga sgravi vphros brjod pa kun nas thos pa don ldan gyi rim pa) 3a。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第 504 页。

[103]《第十世达赖喇嘛楚臣嘉措传》(rgyal bavi dbang po thams cad mkhyen gzigs bcu pa chen ngag dbang blo bzang vjam dpal bstan vdzin tshul khriims rgya mtsho dpal bzang povi mnam par thar pa ngo mtshar nor buvi vphren ba) 257b。关于恰域的活佛和寺院见威利《〈世界广说〉与西藏地理学》,罗马,1962 年,第 174 页, n.554。

[104]《第十世达赖喇嘛楚臣嘉措传》,175a。

[105]《第十世达赖喇嘛楚臣嘉措传》,193a。

[106]关于张格尔的叛乱见魏源《圣武记》,译文见安保罗(C. Imbault)、余阿尔(Huart)《关于中亚的文献汇编》(Becueil de documents sur l'Asie Centrale) 巴黎,1881 年,12-53 页。也见赫梅尔(A.W.Hummel)《清代中华名人》(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华盛顿,1943-1944 年,第 68 页。

[107] 索南版《拉达克王统史》,第 38-41 页。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第 501-502 页。

[108]索南版《拉达克王统史》,第 41-43 页。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第 502-503 页。关于噶伦夏扎顿珠多杰使团见伯戴克《西藏的贵族与政府 :1728-1959》,1973 年,第 162-163 页。

[109]《宣宗实录》,141.6b-7b,148.11a-b。《第十世达赖喇嘛楚臣嘉措传》,194b,201a。罗桑金巴(blo-bzang-sbyin-pa)编《第七世班禅罗桑贝旦贝尼玛传》,223b。伯戴克《西藏的贵族与政府 :1728-1959》,1973 年,第 163 页。

[110]索南版《拉达克王统史》,第 43-44 页。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第 503-504 页。

[111]《宣宗实录》,154.4b-5b。

[112]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第 498 页。但是,根据莫尔克罗夫特《喜马拉雅地区印度斯坦、旁遮普旅行记》第一卷,249 页,1821 年时“他看起来大约 60 岁”。

[113] 莫尔克罗夫特《喜马拉雅地区印度斯坦、旁遮普旅行记》第一卷,249-250 页,335 页。他的名字在与英印政府的协议中拼写为 Kalon Chuhwan Tundi,在莫尔克罗夫特《喜马拉雅地区印度斯坦、旁遮普旅行记》第一卷,249 页被写成 Tsiva Tandu。

[114] 莫尔克罗夫特《喜马拉雅地区印度斯坦、旁遮普旅行记》第一卷,255 页、334 页。

[115]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第 499 页。

[116]《拉达克王统史》,47.7-17。富兰克关于 10-11 行的译

文应当修正如下:“不允许宫殿中的奴仆在夜间卧床或睡觉,因为他们必须签署誓言以将夜晚视为白昼”。《拉达克王统史》的文本再次出现混乱,这段文字出现在次旺顿珠仍健在时,莫尔克罗夫特前往访问之前,很清楚他应该在此之后。参见达塔《拉达克与西喜马拉雅政治 :1819-1848》,新德里,1973 年,70-72 页。

[117]莫尔克罗夫特《喜马拉雅地区印度斯坦、旁遮普旅行记》第一卷,333 页。

[118]《拉达克王统史》,47.5-6。出生时间是根据事实推算出来的,因为 1820-1821 年时,他大约 10-11 岁。见莫尔克罗夫特《喜马拉雅地区印度斯坦、旁遮普旅行记》第一卷,395 页。坎宁罕姆《拉达克 地理、统计与历史》,第 350 页,认为他 1839 年去世时为 21 岁,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119]莫尔克罗夫特《喜马拉雅地区印度斯坦、旁遮普旅行记》第一卷,334 页。

[120]《拉达克王统史》,48.10-11。比巴多杰在次旺南杰时代是根本上师(国王的?)如出现在颇托萨(pho-thog-sa)附近的扎西顿噶寺(bkra-shis-dung-dkar,现已不存在)中的题文(F.76,刊布于富兰克《穆贝的岩刻》,1906 年,第 647-648 页)所显示的那样,他是达仓热巴“语(thugs)”的化身。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第 500 页。

[121]《拉达克王统史》,48.3-6。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第 501 页。关于拉嘉里家族见伯戴克《西藏的贵族与政府 :1728-1959》,1973 年,第 50 页。

[122]富兰克未曾确认他的这个名字,阿杂亚活佛的藏文名字未曾发现,显然已被遗忘。

[123]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第 504 页给出了这个时间。Ms.B 版的《拉达克王统史》给出的时间是水马年(1822 年),这个时间怎么算都是不可能的。

[124]《拉达克王统史》,48.10-19,50.5-6。索南版的《拉达克王统史》,第 45 页。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第 504 页,35b。

[125]《拉达克王统史》,48.2-9。水虎年对应的不是 1782 年就是 1842 年,这两个时间都是不可能的。格尔甘《拉达克王统史——甘露藏》,第 498 页给出的时间是铁虎年(1830 年)。

[责任编辑 索南才让]

[校 对 梁成秀]

Ladakh Kingdom between 950 AD and 1842 AD (VII) .The Decline of Ladakh

Written by Luciano Petech

1. Translated by Zha Luo 2.Proofread by Peng Zhiyan

(1.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Research Center of CASS, Beijing, 100081)

(2. School of Ethnic Studies, Tibet Institute for Nationalities, Xianyang, Shaanxi, 712082)

Abstract: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decline of Ladakh Kingdom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8th Century caused by the dual strikes from the Turk in Kashgar and Mongolian–Tibetan Armies from U–Tsang. Its destiny of decline also signifies that Ladakh Kingdom, an important strength in Himalayas, is terminated.

Key Words: Ladakh, Mughal Empire; Tibet; clashes

The Relationship of Dharma between Four Gulug Temples in Tibet and Labolung Temple in Gansu

Dpav–ris–don–grub

(School of Tibetology, Xiahe, Gansu, 747100)

Abstract Labolung Temple is the highest institution of Tibetan Buddhism in the border area of Gan, Qing, Chuan and Kang and its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have a close connection on Dharma with the four major temples in Tibet. This paper aims to prove this link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ultivation systems in the six colleges of Labolung Temple.

Key Words: four major temples in Tibet; Labolung Temple; Gulug; cultivation system;
Relationship of Dharma

The Function of Tibetan Buddhism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Take Gannan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for Example

Ma Yutang & Guo Yan

(School of Marxism ,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Lanzhou ,Gansu,730030)

Abstract: The ethics of religions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the stability and harmony of a society.This is true of the positive factors in Tibetan Buddhism, such as loving the motherland and the religion and sticking to the ecological ethics. These ideas are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harmony and stability of Gannan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They also set up an example for other regions inhabited by th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Key words: Tibetan Buddhism; harmonious society; positive factors